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蒙古入侵时期的 突厥斯坦

〔俄〕巴托尔德 / 著 张锡彤 张广达 / 译

上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蒙古人侵入时期的 突厥斯坦

〔俄〕巴托尔德 / 著

张锡彤

张广达 / 译

上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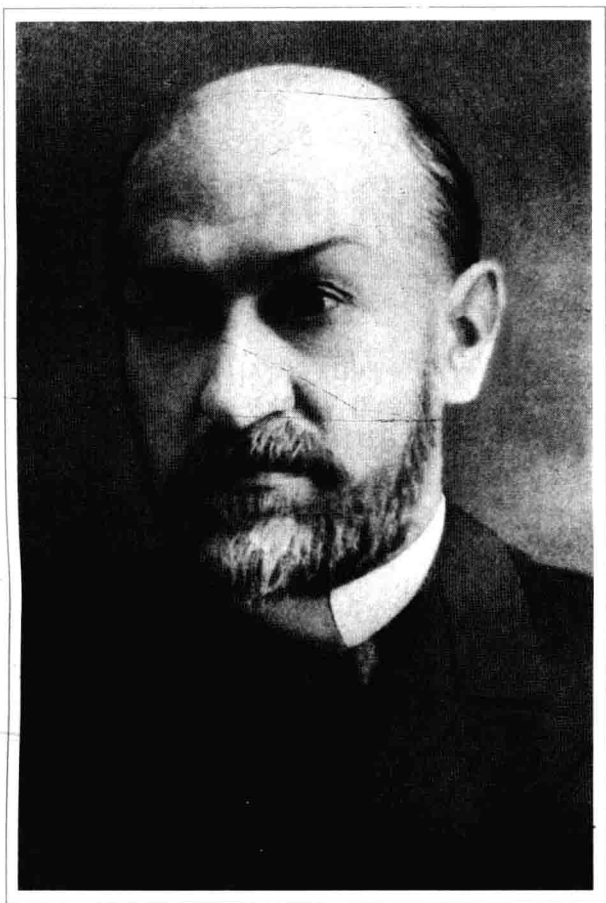
沈卫荣 李 肖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鹤 王立翔 乌云必力格 刘迎胜 汤士华

毕 波 李 肖 芮传明 余太山 沈卫荣 张勇兵
府宪展 孟宪实 荣新江 侯世新 徐文堪



作者像

Академик
В.В.БАРТОЛЬД

© I ©

ТУРКЕСТАН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63

《巴托尔德院士全集》第一卷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俄文版扉页

**T U R K E S T A 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BY W. BARTHOLD

E. J. W. GIBB MEMORIAL TRUST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编辑缘起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国学,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以中国学术要与国际学术接轨为号召。西域研究,尤其是对曾经生活于中国西部地区诸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西域是一个民族迁徙、融合十分频繁的地带,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枢纽,对西域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研究是一门关涉多种学科的非常国际化的学问。是故重视吸收海外西域研究的成果,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国学者之西域研究的水准,而且亦有助于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吐鲁番研究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联合编辑、出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西域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曾与近代中国的形成密不可分。清末中国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当时相当数量的爱国学者积极投身于“西北舆地之学”的研究,其成果对于中国领土不受瓜分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的确立和边疆疆域的界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西北舆地之学”自清嘉、道以后,就因缺乏新资料、新方法而渐趋衰落,而西方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却因另辟蹊径而成绩斐然。以法国学者伯希和为代表的一批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汉学、西域研究学者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和吐鲁番劫走了大量珍贵的西域古文献,他们利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汉语古音和民族、异国语言互相勘同、比对等方法来处理、解释这些多

种语言的古文献资料,其成就超出了中国传统的“西北輿地之学”,在西方中国研究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尽管今日世界的中国研究从方法到内容均已日趋多样化,但西域研究依然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够凝聚世界各国学者的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

从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西方学者不可企及的天然优势,不但数量庞大的有关西域的汉文古文献是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而且西域语言中的大多数是中国国内诸少数民族同胞依然在使用的活语言。中国学者本应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西域研究虽然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一代杰出学者的倡导下有过短期的辉煌,但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当王国维、陈寅恪今天被国人推为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时,中国的西域研究还没有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这样的局面将阻碍中国学术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进程,更不利于多元文化在中国的同存共荣与和谐发展。我们编辑《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意在激励中国学者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内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界的优秀成果,然后发挥我们潜在的优势,扬长避短,冀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国际一流学术水平间的距离,重兴绝学!

沈卫荣 李 肖

二〇〇七年五月

中文版译者序言

瓦·弗·巴托尔德(1869-1930)是俄国的东方学大家;至于今日,在国际东方史学界依然不失为一位享有盛誉的权威。这里译为中文以飨读者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以下简称《突厥斯坦》),是他的成名之作,原俄文本第一版在圣彼得堡出版于1900年,第二版作为《瓦·弗·巴托尔德全集》^①的第一卷在莫斯科出版于1963年。此书之英文译本作为《E. J. W. 吉布纪念丛书》^②的新辑第五种在伦敦刊行,第一版出版于1928年,第二版出版于1958年,第三版出版于1968年。

《突厥斯坦》一书,是瓦·弗·巴托尔德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圣彼得堡大学进修,继而任副教授期间写成的。1900年出版以后,他把它作为取得硕士学位的论文提交大学东方语学系审查。审查和举行论文答辩的结果是,学系授予巴托尔德以硕士学位,而大学会议则因这篇论文出类拔萃,决定破格授予东方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教学、讲学、科学研究、科学考察以及参加学术活动等方面连续作出贡献。早在

① 《瓦·弗·巴托尔德院士全集》(Академик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莫斯科,共九卷十册(第二卷有两分册),1963-1976年。

② E. J. W. 吉布(E. J. W. Gibb)是英国研究土耳其文学的一位学者,系著名英国伊朗学家布朗(E. G. Browne)的早年学友,著有*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享寿不永,卒于1902年,其母痛子心切,出费5000英镑作为基金,委托E. G. 布朗组成托管会,用以刊行与伊斯兰学有关的古籍和著作以资纪念,定名为《E. J. W. 吉布纪念丛书》(E. J. W. Gibb Memorial Series)。第一批受托人为E. G. Browne, Guy le Strange, Jane Gibb, H. F. Amedroz, A. G. Ellis, R. A. Nicholson与E. Denison Ross。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他在东方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已为欧洲各国所公认。

1900年以来,《突厥斯坦》一书因未再版重印,以致逐渐成为难以寻觅的珍本,又此书系用俄文写成,在西欧因懂俄文的人少而读者不多。1922年,巴托尔德与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院长 E. 丹尼森·罗斯爵士商定为此书刊行英文译本。英译本第一版于1928年在伦敦刊行,卷首有 E. 丹尼森·罗斯爵士写的序言。序言中说到“本书也并不是单纯的翻译,因为巴托尔德教授曾亲自细致地加以校订,并参照二十余年来陆续出世的大量新资料加以增补”。序言的结尾又说,“本书译文的校补是在巴托尔德教授躬亲指导下完成的,英文刊本和索引是由 H. A. R. 吉布先生设计和准备的。”译本出版后,一则因此书内容重要,史料丰赡,再则因作者此时已著作等身,名闻全欧,所以立即在欧洲东方学界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人称之为《突厥斯坦》的第二版。由于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懂英文的人多于懂俄文的人,所以《突厥斯坦》英译本所起的作用大于原俄文刊本,而著者研究中亚史地的业绩也因此为更多的人所谥知。

然而,《突厥斯坦》的英文本译文出于何人之手,长期以来,包括前苏联学者在内,却没有人说得清楚。E. 丹尼森·罗斯在英译本序言中只是说在准备英译本过程中,巴托尔德亲自从事校订工作,H. A. R. 吉布负责版面设计并编写索引,只字不及此书译者为何人。1976年,巴托尔德的门生、撒马尔罕大学的 И. И. 乌姆尼亚科夫(И. И. Уминяков)教授编纂的《附有解说的 В. В. 巴托尔德论著目录》^①一书在莫斯科出版,该书页 131-2 的脚注中说到:“关于《突厥斯坦》英译本的准备过程,经我函询,米诺尔斯基(В. Ф. Минорский)教授在1961年3月5日写给我个人的一封信中亲切地告诉我,‘当时年轻的吉布并

^① Уминяков,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трудов В. В. Бартольда; Н. Н. Тумановин, Описание архива В. В. Бартольда, Москва, 1976 年。

未对《突厥斯坦》的原文作任何修改,翻译工作是由一位俄国女士一手完成的。吉布看了一遍她的译文,至于内容上的改动,则一概出于应 E. 丹尼森·罗斯爵士之请来到伦敦的巴托尔德本人之手’。”

看来为《突厥斯坦》1928 年英译本的刊行拿主意、定计划的人,与其说是巴托尔德本人,还不如说是 E. 丹尼森·罗斯爵士^①。恰如罗斯在英译本前言中所说的,“本书也并不是单纯的翻译而已”,不过关于译本异于原著之处,罗斯仅仅说到著者本人曾对原著加以校补,这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原著以 *Туркестан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为标题,而英译本则改为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以蒙古入侵为下限的突厥斯坦史》),这显然是更值得注目的异点。又与此相关的另一异点是原著中的《著者前言》在译本中为罗斯本人所写的序言所取代。标题与前言均被改换的原因何在,我们有在这里试加解释的必要。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沙皇俄国在东亚与中亚方面因利乘便,巧取豪夺,连续囊括中国与中亚诸国大片的领土。为了经略新攫取的土地,沙俄政府首先倡导对中亚与东方史地进行研究。到了这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志在治东方史学的巴托尔德选定《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

① E. 丹尼森·罗斯(E. Denison Ross, 1871 - 1940) 是英国的东方学家,自青年时代起即常出国游历,通晓多种外语。1894 年,在施特拉斯堡大学,因精通波斯语而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罗斯到圣彼得堡看望他在沙俄任监造舰技师之兄 A. 罗斯,得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院长维克托·罗森男爵(Baron Victor Rosen) 结识,并曾旁听罗森讲授的阿拉伯语课程,从而与瓦·弗·巴托尔德成为同出于罗森门下的学友。1895 - 1900 年,罗斯任伦敦大学波斯语教授,休假期间,再次游历俄国,足迹曾至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并于归途初次访问波斯。1910 年起,罗斯在印度先后充任加尔各答经文学院(Calcutta madrasah) 院长及印度政府档案保管员。1909 年休假期间曾游历中国。1914 年,罗斯返回伦敦,一度在不列颠博物馆整理 A. 斯坦因自中亚及中国甘肃新疆境内窃取之文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先被调到军政部服务;1916 年,伦敦大学增设东方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聘罗斯为院长,任职达 22 年之久,1938 年退休。

E. 丹尼森·罗斯校订并翻译了一些阿拉伯语及波斯语文史旧籍,如在 1894 年曾将穆罕默德·海德尔撰《中蒙兀儿人历史》译为英文(Muhammad Haidar, *Tarikh-i-Rashidi*, 伦敦, 1895 年;再版, 1898 年;再版重印本, 1972 年)。罗斯曾与 F. H. 斯克林合撰《亚洲的心脏》一书(F. H. Skrine & E. D. Ross, *The Heart of Asia*, 伦敦, 1899 年),此书有关 1881 年以前的记述成于罗斯之手。罗斯亦撰有自传,题名《蜡烛的两端》(*Both Ends of the Candle*, 伦敦, 1943 年),意在表明自己多才艺,广交游,在治学与从政两头忙乱中耗尽一生。

坦》这一标题写出一部专著以适合时尚,这是不足为奇的。与众不同的是,巴托尔德在为《突厥斯坦》拟定了编写提纲以后,排斥教士商旅的道听途说而集中精力于搜集第一手资料。他用了几年的时间阅读当时通常以抄本形式见知于世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中亚地志、史籍,并选录大量重要史料编为《原文资料选辑》,作为《突厥斯坦》的第一编,于1898年在圣彼得堡刊出,是为本书的资料编。资料编只印了这一次,以后未再重印过。190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突厥斯坦》——与资料编相对而言,被称为第二编,亦被称为研究编——才是巴托尔德就自己钻研所得精心结撰的成果。现在我们提到《突厥斯坦》这部书,通常仅指其研究编而言。

巴托尔德编写《突厥斯坦》的研究编,本想局限于与蒙古入侵直接相关的时期,下限至1269年中亚出现了独立的蒙古国家为止。然而他逐渐觉察人们并不曾仔细而一贯地探讨过蒙古入侵以前中亚历史中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也逐渐发现为成吉思汗逝世(1227年)以后至1269年止的一段中亚史搜集资料,必须对汉文史籍予以足够的重视,可是他自己不懂汉文,以致碰到如《元史》这样大部头或如元人文集这一类浩渺而星散的载籍,在其未转译为西文以前,他束手无策,只好停工待料。他本已为从1227年到1269年的一段中亚史写出底稿,这就是由И.彼得鲁舍夫斯基(И.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初次刊布于《突厥斯坦》俄文本第二版的第五章。今日看来,他本人曾犹豫多时,终于决定将这一章作废,这只表明他苦于不明汉文史籍的底细,以致失掉了刊布这一章的信心。也正是因为原定的写作计划必须变更,要收缩原定的年代下限并扩展蒙古入侵以前时期的历史沿革,以致全书最后定稿时,蒙古入侵时期所占篇幅竟不及全书的五分之一。这样,以书的内容与其标题《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相对照,显然存在着比例失调、头重脚轻的缺陷。关于这一点,巴托尔德本人颇有自知之明,为了向读者表示歉意,《突厥斯坦》1900年俄文版《著者前言》的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本书读者将觉察到,本书的标题与其内容并不完全相符”。下文又申明:

“在我们看到《元史》的完整译本以前,要想了解十三、十四世纪的中亚历史,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大约也正是经过这番挫折,他才注意扬长避短,转向中亚突厥历史,高加索与中、近东史地和伊斯兰学方面发展,不复在蒙古学方面花费过多的力量。

在巴托尔德与 E. 丹尼森·罗斯会商刊行《突厥斯坦》的英译本时,可能是由罗斯建议,征得巴托尔德的同意,将原俄文本的标题《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改变为《以蒙古入侵为下限的突厥斯坦史》。改用了这一标题,蒙古入侵以前的突厥斯坦史自然上升为全书的重点,从而头重脚轻,文不对题的情况也就不像在原俄文刊本中那样明显。标题这样改动以后,巴托尔德写的《著者前言》自然也必须改写,负起改写责任的是 E. 丹尼森·罗斯,他所写的序言的第三段特别值得注意,兹照录全文如下:

本书也并不是单纯的翻译而已,因为巴托尔德教授曾亲自细致地加以校订,并参照近二十余年来陆续出世的大量新资料加以增补。至于在校订、增补之后,全书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动,这恰好对著者前此旁征博引的详赡,考订史实的正确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这样,西方读者便得到了一部起于伊斯兰教开始武装进攻、断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登场的中亚历史,把这段历史的细节写得如此面面俱到,看来惟有巴托尔德教授能胜此任。

不可低估《突厥斯坦》英译本的影响,也不可低估罗斯写的这篇序言的影响。自英译本于 1928 年出版问世以来,至少在西方读者中间,《突厥斯坦》逐渐被认为是一部中世纪中亚史,“蒙古入侵”云云不过是这部中亚史的下限,并不是它的重点。将这部书的重点从蒙古入侵的时期转移到入侵以前的时期,这便是英译本改变书名和序言的原因所在。

《突厥斯坦》的 1928 年的英译本出版后,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

(1878-1945)颇以得读多年来未能觅得的这部巨著为快。在细读一过以后,他认为书中与穆斯林文献有关的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字句可以指摘,但在与蒙文及汉文资料有关的事实和名词方面,则须提出一系列意见供著者参证。伯希和为向著者提供意见而写的书评,标题作“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发表于《通报》第二七卷(1930年),页12-56^①。巴托尔德很重视这篇书评,曾将他认为应该接受的伯希和的意见一一附记在他自用的英译本的页缘上。不幸此后不久,未及进行订正,他就与世长辞了。

上述由巴托尔德亲自校订的《突厥斯坦》英译本第一版刊行於1928年,到1958年才又刊行第二版,第二版的校订者为巴托尔德的门生、以治伊朗学闻名的V.米诺尔斯基教授(1877-1966)^②。米诺尔斯基教授作了为数不多的若干条补正,比较醒目的是在卷首附加了由他本人译为英文的巴托尔德编写的《论文提纲》,亦即《突厥斯坦》一书的提纲。《突厥斯坦》英译本的1958年第二版实际上不过是1928年第一版的复印本。

《突厥斯坦》的英译本第二版刊出后不久,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于1960年6月通过决议,为科学院院士瓦·弗·巴托尔德的著作编印全集。如上所述,《突厥斯坦》列为《全集》的第一卷,对此卷负校订之责的为东方学家И.彼得鲁舍夫斯基。1963年,《全集》第一卷出版于莫斯科,是为《突厥斯坦》的俄文本第二版。

为了准备《突厥斯坦》的俄文本第二版,И.彼得鲁舍夫斯基辛勤恳恳地地下了一番校勘整理的工夫。他以俄文本第一版为底本,不但收

① 伯希和和这篇书评业经冯承钧氏译为中文《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重印,页1-53。

② 约与校订《突厥斯坦》的英译本同时,V.米诺尔斯基教授与其夫人J.米诺尔斯基合作,将巴托尔德的关于中亚史的其他几种著述译为英文,分卷陆续出版,题名为《瓦·弗·巴托尔德中亚研究四种》(一至三卷,莱顿,1956-1962年)。又图曼斯基(A. T. Туманский)发现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抄本于1930年在列宁格勒刊行,卷首有巴托尔德写的引言。此书之英文译注本亦成于V.米诺尔斯基之手,列为《E. J. W. 吉布纪念丛书》新辑第十一种,于1937年在伦敦刊出,其经C. E. 博斯沃思校订的第二版刊出于1970年。

录了巴托尔德本人为1928年英译本第一版所作的增补与订正,而且也遵循巴托尔德进行补正的成例,就出现于1928年以后的新资料、新刊本以及新的研究成果等,斟酌去取,续加补正。由于无论巴托尔德的或彼得鲁舍夫斯基的补正几乎都涉及次要细节,有关正文者较少,所以绝大多数仅见于脚注。在俄文新版中,凡出于彼得鲁舍夫斯基本人之手的补正,他一律置于尖括弧即〈……,——校订者〉以内作为标志,在此中文译本中,我们用方括弧即〔……〕代替了他的标志;至于我们自己为了有所补充也偶然写出的附注,则括以弦月形括弧即『……』以资区别。总的说来,彼得鲁舍夫斯基氏在其准备《突厥斯坦》俄文本新版的过 程中,既保持了俄文本旧版的原状,又摄取了英译本第一、二两版对俄文旧版的补正,因此俄文本新版得以具有汇校本的优点。

然而由于彼得鲁舍夫斯基要保持《突厥斯坦》俄文本旧版的原状,他就不得不抛弃巴托尔德本人同意过的英译本的书名,仍用俄文原著的标题《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他也必须抛开E. 丹尼森·罗斯为英译本写的序言,仍然摆上巴托尔德本人写的《著者前言》。这样做的结果,确实有利于保持俄文旧版的原状,可是这样做也使得我们在上文指出的原著头重脚轻、文不切题的缺陷重新暴露了出来。

经过彼得鲁舍夫斯基的辛勤加工,《突厥斯坦》的俄文本新版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首先,他为巴托尔德写了一篇生平事略置于卷首,这篇事略不但报道了巴托尔德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而且也显示了巴托尔德一生待人接物像他作学问同样切实认真,守正不阿。其次,他为《突厥斯坦》俄文本新版写了一篇简练紧凑而又面面俱到的序言。正如他自己说过的,“把中亚史的研究提高到当代历史科学水平的,实以巴托尔德为第一人,试以不多的字句来说明这部巨著的重大意义,确非易事”。他写的这篇序言很有条理、很有内容,等于记述他本人的读后感,从而有助于读者把握全书的基本内容。其次,新版的最大特色在于彼得鲁舍夫斯基刊布了《突厥斯坦》第五章的底稿,并为这一章补写了大事年表。关于巴托尔德本人曾决定将这一章作废的原因,我们已在

上文提过了。彼得鲁舍夫斯基刊布这一章,毕竟是对新版读者有所助益的,无待烦言。

复次,彼得鲁舍夫斯基还为新版增加了附录,其中包含两个文件,均与1900年为授予巴托尔德以硕士学位而举行的论文答辩有关。一为《论文提纲》,即作为论文被提请审查的《突厥斯坦》一书的提纲。此《论文提纲》先已由V.米诺尔斯基译为英文并刊载于《突厥斯坦》英译本第二版的卷首。另一为巴托尔德编写的《论文答辩前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与《突厥斯坦》的第五章相同,都是由彼得鲁舍夫斯基氏经手刊布问世的。单就刊布这篇发言稿来说,他们将读者引导到论文答辩会的旁听席上,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地听取巴托尔德口述东方学研究在俄国兴起和发展的经过,以及他本人在东方学研究中一贯具有的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坚强信心,这对于我们了解见于《突厥斯坦》书中的许多论点,显然是必要的。

最后,彼得鲁舍夫斯基氏还按照《巴托尔德全集》编辑部的规划,为《突厥斯坦》编排了很长的《文献目录》,目录分为(一)史料;(二)研究著作与参考书两大部分。二者被严格区分,绝不牵混,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在这里,我们顺便说明,我们不曾把《文献目录》译为汉文,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一,著者在正文和脚注中引用的文献,我们多随译文作了翻译;二,对读者说来,如有必要进一步检索文献,自以直接利用原文较为便当。

在《突厥斯坦》俄文本第二版增补了第五章以后,英译本也有了刊行第三版的必要。1966年,《吉布纪念基金》托管会将刊行第三版的准备工作交由曼彻斯特大学阿拉伯学教授C. E. 博斯沃思(C. E. Bosworth)承担;1968年,增补了第五章的英译本第三版在伦敦刊出问世,书的标题仍为《以蒙古入侵为下限的突厥斯坦史》。

《突厥斯坦》英译本第二版事实上系英译本第一版的复印本,同样,英译本第三版由页1至页462,即由绪论起至第四章结尾,曾经博斯沃思教授加以补正,但基本上依然是第一版的复印本。第三版页

463 以下至页 519 为依据《突厥斯坦》俄文本新版增补的第五章,这一章是由 J. 米诺尔斯基夫人译为英文的。这一章的脚注除巴托尔德本人的原注外,其为俄文本新版的校订者彼得鲁舍夫斯基氏所附加的脚注,在此中文译本中均置于方括弧内,其仅见于英译本第三版为 C. E. 博斯沃思、J. A. 博伊尔(J. A. Boyle)等人所附加者,亦各括以方括弧并标出 C. E. B. 与 J. A. B. 等名姓起首字母以资区别。英译本第三版未在《大事年表》中增补 1227 年以后的部分;见于俄文本新版《附录》中之《论文答辩前的发言》并未补译;又《文献目录》亦较简略,且未将史料与研究著作分别开列。

《突厥斯坦》英译本第三版的第五章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译文比较粗疏,并有些不应出现的失误。看来《突厥斯坦》一书的诸英译本,就译文质量而言,第一版已有不少问题,而第三版质量之差更属每况愈下,因此,F. H. 斯图尔特在其标题为《中亚史的古典著作巴托尔德撰〈突厥斯坦〉一书的俄文与英文诸版本》书评^①中对英译本各版所作结论似非过苛。他说:“一般说来,译文不佳也是常见的情况,不过此书的英译本,在长达四十年的时期内,照印三次而不加厘正,这就殊属罕见了。昔在 1917 年,戈尔德齐赫尔(Goldziher)撰《伊斯兰教讲义》的英译本刊行后,因译文不佳,书店主人认为必须立即全部回收作废。关于《突厥斯坦》的英译本,我们并不提倡采取同样的措施,不过对于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或者刊行经过订正的英译本,或者用其他西欧语言另译完善的译本,毫无疑义还是十分可取的。”

总的说来,在《突厥斯坦》一书之俄文与英文的诸版本中,截至目前,自以刊行于 1963 年之俄文本第二版最为完善,虽则并非全无瑕疵。遇有英译本与俄文本第二版相歧之处,此中文译本通常依据后者定取舍之准。

^① F. H. Stewart, "A Classic of Central Asian History: Barthold's 'Turkestan' in Russian and English", 见 *Asian Affairs*, 第五七卷(新辑,第一卷), part I, 1970 年,页 51。